

“一”的降临与帝国的命运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绎读

张 源

摘 要：《巴门尼德》既是全部柏拉图对话的开端，也是其结局。《巴门尼德》篇所涵盖的时间，从公元前454年雅典帝国泛雅典娜大节的盛世庆典开始，直至公元前404年帝国覆灭，又在公元前387年雅典几乎无望重回巅峰的时分，遥遥指向公元前378年第二雅典帝国的重建。少年苏格拉底在本篇第一次亮相，爱利亚大哲巴门尼德与芝诺的示范与教导，深刻影响了雅典哲人苏格拉底的一生，也影响了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雅典帝国中后期的思想形态。《巴门尼德》将所有柏拉图对话包裹其中，此后一切篇章，无不由此而起，当初那场对话的影响与后果，将在后续对话中渐次展开。《巴门尼德》本身是一场关于“一”的对话，同时也是全部柏拉图对话之“一”——“一”是开端，也是结局，它既在自身中，又在一切事物中。

关键词：《巴门尼德》 苏格拉底 雅典帝国 一

如果没有形而上学，权力就是真理。——叶秀山

柏拉图戏剧对话四十二篇，《巴门尼德》就对话时序而言位列第一。该篇分为两部分：巴门尼德与苏格拉底等人的核心对话（127b—166b）以及后人对这场对话的三重转述（126a—127a）。核心对话发生于所有其他柏拉图对话之前，三重转述发生于所有其他柏拉图对话之后，从而《巴门尼德》的叙事框架将全部柏拉图对话包裹进来，构成了后者的开端与结局。

核心对话（127b—166b）

时间：前 454 年 7—8 月，泛雅典娜大节期间

地点：雅典城外凯拉米库，将军皮索多鲁家

人物（按出场次序排列）：

芝诺（约前 495—约前 430 年，爱利亚哲人，巴门尼德的义子与学生）

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 年，雅典大哲）

两位不知名的在场发言者（129d）

皮索多鲁（约前 484—，雅典将领，芝诺的朋友与学生）

巴门尼德（约前 521—，爱利亚学派创始人，芝诺的义父与老师）

亚里士多德（前 469 年之后—，未来的雅典三十僭主之一）

三重复述（126a—127a）

第一重转述

时间：前 412—402 年之间

地点：未知

人物：皮索多鲁（约前 484—，雅典将领，芝诺的朋友与学生）

安提丰（约前 426—423—，柏拉图的同母异父弟弟）

第二重转述

时间：前 387 年

地点：安提丰家

人物：克法劳斯（约前 444—，雅典格劳孔兄弟的克拉佐门尼友人）及其同伴

格劳孔（约前 444—，柏拉图的哥哥）

阿德曼图斯（约前 444—，柏拉图的哥哥）

安提丰（约前 426—423—，柏拉图的同母异父弟弟）

第三重转述

时间：前 387 年之后

地点：小亚细亚克拉佐门尼一带

人物：克法劳斯（约前 444—，雅典格劳孔兄弟的克拉佐门尼友人）

不知名的听众

柏拉图四十二篇对话，从对话形式而言，分为直接对话三十二篇（其中包括两篇讲辞《申辩》与《德谟多科斯》）与转述对话十篇。《巴门尼德》是转述对话中形式最复杂的一篇，其三重转述结构在柏拉图对话中绝无仅有：对话的转述者凯法卢斯告诉（不知名的）听者，当年自己与同伴离开克拉佐门尼来到雅典，遇到了旧友阿德曼图斯和格劳孔（柏拉图的两个哥哥），大家同去寻访安提丰（柏拉图的同母异父兄弟），后者转述了雅典将军皮索多鲁（芝诺的朋友与学生）在多年前转述的苏格拉底与巴门尼德和芝诺在更久之前完成的一场对话。

我们现在便返回到这场对话的源头。凯法卢斯说，据安提丰转述，皮索多鲁是这样讲的：芝诺和巴门尼德曾在泛雅典娜大节^①时来到雅典，当时巴门尼德大约六十五岁，芝诺不到四十岁，而苏格拉底那时还极其年轻（127bc）。研究者通常认为，柏拉图笔下的巴门尼德到访雅典的时间（当然历史上未必真有其事），应当是在公元前 450 年 7—8 月间。^②这个年份意义重大：这是雅典贵族领袖客蒙去世、民主领袖伯里克利全面掌握政局的年份；在这一年欢庆泛雅典娜大节，正是雅

① 泛雅典娜大节（τὰ Παναθήναια）庆典四年一度，于当年 7—8 月间举行。这一庆典在雅典古已有之，据说系由雅典神话国王忒修斯设立，并在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治下蔚然大兴。See William Smith et al., eds., *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London: John Murray, 1890), "Panathenaea". 按：忒修斯时代（约前 8 世纪）与庇西特拉图时代（前 6 世纪）分别是雅典城邦崛起与振兴的时代，此后随着雅典帝国（前 478—前 404 年）登上历史舞台，各邦民众齐聚雅典、尊崇雅典守护神的庆典更具象征意味。特别是雅典帝国于公元前 454 年加强统治、悍然将提洛同盟的金库转移到雅典之后，泛雅典娜大节的政治属性可想而知将更加凸显。

② See R. E. Allen, *Plato's Parmenid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72-73.

典民主制帝国一往无前、普天同庆的时分。

然而，我们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推测，实际上公元前 454 年的那次泛雅典娜大节与柏拉图给出的时间提示更加接近：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巴门尼德的“鼎盛年”在第六十九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公元前 504—500 年），芝诺的“鼎盛年”在第七十九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前 464—460 年），^①以“鼎盛年”（成年男子个人成就的巅峰纪年）的最低年龄（21 岁）计算，^②巴门尼德的出生年应在公元前 525—521 年间，我们取巴门尼德可能的最晚生年（前 521 年），同时将《巴门尼德》的戏剧时间向前推进一个大雅典娜节（前 454 年），如此方能符合柏拉图给出的时间标记——“当时巴门尼德大约六十五岁”。进而由此推算，当时苏格拉底只有十五岁——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才会使用这种含混的字眼：苏格拉底那时还“极其年轻”（σφόδρα νέον）（127c）。

柏拉图为何不直接说出确切的年份？这就是柏拉图对话的有趣之处。公元前 454 年夏天，雅典帝国悍然将提洛同盟的金库转移到了雅典，这一事件标志着雅典帝国无视统治合法性问题、公开背弃盟约，彻底走向了“帝国主义”。当年 7—8 月间，泛雅典娜大节在雅典胜利举行，此时意大利爱利亚学派（奉行与雅典民主制帝国盛行的多元哲学相悖之一元哲学）的领袖巴门尼德与芝诺到访雅典却寄身城外（127c），^③

① See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trans. by R.D. Hic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Book IX, 3.23, 5.29.

② See R. Larry Overstreet, “The Greek Concept of the ‘Seven Stages of Life’ and Its New Testament Significance”, in *Bulletin for Biblical Research* 19.4 (2009), p.554. 根据古希腊人的观念，男子真正成年、开始取得巅峰成就的年纪乃是 21 岁。人们通常根据《巴门尼德》公认的戏剧时间（前 450 年）来估算巴门尼德的生年（前 515 年）与芝诺的生年（前 490 年），然而，如果巴门尼德生于公元前 515 年，那么他的“鼎盛年”（公元前 504—500 年）就应该是在 11—15 岁之间，而这是不可能的。从而，根据巴门尼德有典籍记载的生年来估算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的戏剧时间显然更为合理。

③ 到访雅典却寄身城外这一细节，透露出巴门尼德与芝诺对于如日中天的雅典帝国的微妙态度，进而这反映出来的其实是柏拉图本人的态度。

在朋友的私宅中向年轻的苏格拉底亲身示范哲学对话/辩证术之妙，这一场景本身便妙不可言——柏拉图似乎想要告诉我们：就在帝国霸道崛起的时刻，哲学已悄然来到雅典城外。

故事一开始，已是在事情中间：（对话的第一重讲述者）皮索多鲁回到家中，苏格拉底和其他几个人正在聆听芝诺宣读论文，已过大半。与皮索多鲁一同回来的，还有巴门尼德和后来成为雅典三十僭主之一的亚里士多德（127ed）。此亚里士多德非彼（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色诺芬的《希腊史》记载了三十僭主名单，这位亚里士多德排在第二十八位（2.3.2）。

哲学对话还未正式开始，柏拉图用三个词“*τῶν τριάκοντα γενόμενον*”（“后来成为三十人之一”）瞬间把我们带入了公元前404年雅典那场政治风暴之中。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落败，敌国斯巴达选派当地三十人（即所谓三十僭主），在雅典实施恶名昭著的恐怖统治；雅典不但失去了帝国，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亦被强行废除，这一年成了雅典人有史以来最惨痛的记忆之一。巴门尼德来雅典的年份是公元前454年，当年的雅典帝国傲视希腊诸邦、不可一世，孰料不过五十年的工夫，繁华盛景便已成空。柏拉图一边带我们回到那繁华盛景的现场，一边不动声色地提醒我们此为空相。

柏拉图告诉我们，现场共有七个人（129d）。由此我们得知，除巴门尼德、芝诺、皮索多鲁、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之外，还有两个人在场，他们就是当时与苏格拉底一起聆听芝诺宣读论文的人。这两个人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三十僭主成员亚里士多德这样敏感的名字，皮索多鲁事后都肯说出，这两人的名字他却讳莫如深。

这两人定非等闲之辈。七位在场者显然彼此熟识、关系密切，并且有着共同的哲学倾向与精英气质。芝诺说“不宜在大众面前如此谈话”，在场者均对此心领神会（136de）。千百年来，本篇对话号称柏拉图谜题中之最大者，令无数研究者望而生畏、不能卒读，原是由于“大众不宜”。陈忠寰（康）先生有云：猜谜的工作始自新柏拉图派（公

元3—6世纪)，经过了一千数百年至今尚无一人猜透。而陈先生自己，就是这一千数百年来破解谜题的第一人。千载之下，听懂这场谈话的人竟只出了一个，柏拉图笔下的这七个人欺人太甚。

这七个人当中，参与对话者有四位：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在旁聆听者有三位：皮索多鲁和另外两人。皮索多鲁此前听过芝诺宣读整篇文章（另外两人则刚刚听芝诺读完论文），半途进来的亚里士多德“只听了论文的一小部分”（127d）。知晓全文的皮索多鲁与另外两人做了听众，一知半解的亚里士多德却担任了对话者。而芝诺的论文全貌究竟如何？我们突然发觉，自己对此其实一无所知——我们才是真正半途进来的人。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场景：芝诺读完论文之后，苏格拉底当即概括文章的核心论题为“事物不是多/多不存在”（127e）；而我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只能依赖苏格拉底的转述了。好在这一总结得到了作者本人的首肯，此时苏格拉底却立刻转向了巴门尼德，指出巴门尼德断言“一切是一”、而芝诺断言“一切不是多”，二人的论证看似不同、实则是一回事。苏格拉底直截表示，这种论证未见其妙。（128ab）

在苏格拉底看来，事物分有（μέθεξις）对立的“相”（εἶδος），分有“一”则为“一”，分有“多”则为“多”，从而事物既是一、又是多，“一”“多”一体，不足为奇（129ab）。相：旧译理念，今从陈忠寰先生定译，理念论随之为相论。苏格拉底将一切分为“相”与分有“相”的个别事物，认为事物“一”“多”一体，这与巴门尼德“一切是一”、芝诺“一切不是多”的信念背道而驰。问题在于，作为“相”本身的“一”与“多”如何统一？苏格拉底表示，如有人指出，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始足令我惊异；进而，如能将“相”本身与具体事物统一起来，方更能令我惊异（129b—130a）。

这是全部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的第一次亮相暨发言：少年苏格拉底年方十五，上来便虎虎生风、先破后立，矛头直指两位哲学前辈，

并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相论”——这也是他此后终其一生念兹在兹的题目。苏格拉底这段发言（129a—130a）是《巴门尼德》篇的关键所在。此时少年苏格拉底尚无力解决关于“相论”的难题，因而产生了“苏格拉底之问”，而要巴门尼德与芝诺解答这一难题，无异于让他们进行有违自身哲学信念的论证。然而，柏拉图笔下的巴门尼德竟然出手替他解决了疑难！这意料之外的“巴门尼德之答”即为《巴门尼德》篇的精要部分。在这里仍显稚嫩的苏格拉底的“相论”此后将在《理想国》、《会饮》、《斐多》诸篇中发展更新，巴门尼德的论证亦会在《斐勒布》、《智者》、《政治家》诸篇中引发回响。

天才少年苏格拉底锋芒毕露、以自己的哲学信念挑战两位前辈大哲，在这个紧要之处，柏拉图宕开笔墨，转而去描写旁观者皮索多鲁的内心活动：皮索多鲁本以为巴门尼德与芝诺随时都有可能被激怒，然而却看到他们非常认真地听苏格拉底讲话，并一再相视而笑，似乎对苏格拉底大为欣赏（130a）。试问面对苏格拉底的诘难，多少人气急败坏，气定神闲者能有几人？柏拉图传神一笔，巴门尼德与芝诺的大哲风度跃然纸上。

苏格拉底言毕，巴门尼德表示嘉许，随即指出苏格拉底“相论”的问题所在：1. 苏格拉底认为“相”与分有“相”的个别事物是分离的（χωρίς）（130b），2. 苏格拉底认为“相”是单一的（ὁλος）（131a），而这样的“相”是不能为个别事物所分有的（131c）。巴门尼德目光如炬，直中要害，苏格拉底立即省悟，连声称是。

巴门尼德进而指出，“相”如果是单一的、并与个别事物分离，对应无穷的事物便会生出无穷的“相”来，因此这“相”将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在数量上无穷尽的（131e—132b）。苏格拉底对曰：设若“相”为思想（νόημα），存在于灵魂（ψυχή）中则如何？（132b）巴门尼德反问：因此一切皆为思想？（132c）苏格拉底立刻意识到问题所在，被迫再次修正“相”的定义：设若“相”为模型（παράδειγμα），存在于自然（φύσις）中，其余皆为仿本（ὁμοίωμα），所谓事物分有“相”，

实为类似“相”，此则如何？（132d）至此明眼人应该看出，苏格拉底日后的经典“相论”（具体见于《理想国》）已快要被巴门尼德逼显出来。

然而巴门尼德穷追不舍、再度进击，为苏格拉底的“相论”制造了新的困难：如“分有”即为“类似”（*εἰκάζω*），那么新的“相”将不断产生，以至于无穷（133a），从而便回到了最初的困难（见前131e—132b部分）。注意巴门尼德并未质疑“模型”论本身，只是批评“类似”说行之不通，这为苏格拉底日后进一步完善“模型”论留下了空间。

苏格拉底尚在沉吟，巴门尼德继续指出“相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如果苏格拉底仍企图维持“相论”的两种性质，即1.“相”与分有“相”的个别事物是分离的（见前130b部分），2.“相”是单一的（见前131a部分），由此可知，我们既无法拥有“相”本身，“相”也不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进而“相”本身对于我们是不可知的，美本身、善本身同样如此（133b—134c）。苏格拉底答曰：怕是如此。这个回答引人玩味。须知苏格拉底毕生的功课，便是求索“美本身”与“善本身”之真相，或者说，是破解巴门尼德的魔咒——“相”本身对于我们是不可知的。当我们一路跟随苏格拉底思考，要记得苏格拉底在他的哲学人生开始之初，遇到了难以逾越的伟大的巴门尼德，而对方带给他的“影响的焦虑”伴随了这位雅典大哲的一生。

指出最大困难之外，巴门尼德尚有一个更可怕的推论：如果“相”与我们这个世界分离，那么处于“相”的世界的神，既不可能对我们实施统治，也不可能认识我们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事物（134cde）。苏格拉底闻言惊呼起来：这个论证真是令人惊异！苏格拉底在挑战巴门尼德与芝诺之初，连用了六次“惊异”（*θαυμαστός*）一词（129b一次，129c三次，129d一次，129e一次）；在巴门尼德对“相论”发出致命六连击之后（131c其一，131e—132b其二，132c其三，133a其四，133b—134c其五，134cde其六），苏格拉底终于发出了“惊异”之叹。陈忠寰先生指出，苏格拉底的企图，用希腊哲学术语表达，乃是“拯

救现象”，本篇对话中的“芝诺”是不顾现象的（否认“一切为多”），这代表了历史上爱利亚学派的真精神，而“少年苏格拉底”反对“芝诺”，即在于注重现象（“多”）（《巴曼尼得斯篇》，商务印书馆，2010年，注47）。苏格拉底试图沟通“一”与“多”以“拯救现象”，但只要“相”与个别事物是分离的、“相”本身是单一的，“一”与“多”便无法统一。至此巴门尼德已将苏格拉底“相论”的内在缺陷与存在的问题一并指出，少年苏格拉底“拯救现象”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巴门尼德温言抚慰苏格拉底：这是“相论”必然具有的困难，唯有天资非凡的人才能认识“相”，而在认识“相”之外，还能教导他人正确分析、理解事物的人，才更令人惊异（135ab）。巴门尼德显然在用对方的词汇（“惊异”）来引导对方，而这句话既是巴门尼德夫子自况，也成了苏格拉底日后的人生指针。

苏格拉底欣然称是，孺子可教。巴门尼德由此开始引导苏格拉底进入哲学：讨论美、正义、善等大话题固然是好的，然而在此之前，应该趁年轻、以“闲谈”之法训练自己。苏格拉底追问：这是怎样的一种训练方法？巴门尼德回答：这就是你从芝诺那里听到的方法（135d）。此前苏格拉底对芝诺的论文颇为轻视，芝诺本人随后的答辩亦令人失望“这篇论文是我在年轻好胜时写成”（128de），似有悔其少作之意。而巴门尼德在苏格拉底心悦诚服之际，忽然重提芝诺的论文，这令我们意识到：或许苏格拉底才是“年轻好胜”的那一个，而我们也因为不得不依赖苏格拉底对芝诺的评判，从而受到了误导、忽略了芝诺论文的意义。巴门尼德遂以芝诺的论题为例，向苏格拉底简述哲学训练门径，其核心要义乃在于辩证法（*διαλεκτικός*）（135e—136abc），而辩证法正是芝诺的发明。

前面巴门尼德向苏格拉底展示了哲学的力量，现在终于要为他开启哲学的大门，我们对此满心期待！就在这时，柏拉图插入了一段有趣的描写：当苏格拉底真心向学、表示愿闻其详，巴门尼德却以年近相辞。苏格拉底转而求诸芝诺（他不再轻视芝诺了），芝诺笑着说：

苏格拉底啊！这事得求巴门尼德自己（136cd）。芝诺为何要笑？巴门尼德佯称老迈，少年苏格拉底就信以为真。于是芝诺笑着代他请求巴门尼德亲自传授，其他人也跟着一起恳求，巴门尼德终于应允（136e）。

这是柏拉图第二次描写芝诺的笑；第一次是当苏格拉底批评芝诺的论文，芝诺含而不露，与巴门尼德相视而笑。据柏拉图描述，芝诺到访雅典之时，年近四十，身材高大，容颜俊美（127a）。一个正值最好年华的温柔爱笑的美男子，这就是柏拉图呈现给我们的芝诺的形象。然而这个形象与史料记载的芝诺差异颇大：据第欧根尼记述，芝诺辩才无敌，性烈如火，蔑视强权，不容他人轻辱。雅典帝国正当如日中天，他却终生固守家园，几乎从未到访雅典。无论是在哲学研究、还是在政治生活方面，芝诺都具有高贵的品格：他是伟大的哲人，发明了辩证法，传世著作充满了智慧；他也是真的勇士，曾试图推翻僭主未遂被捕，在审讯时假意招供，引诱对方靠近后咬下他的耳朵，然后咬断自己的舌头啐向僭主，最后被投入石臼活活捣死（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Book IX, 5.25–29）。美好的哲人芝诺，竟是如此壮烈的死法！世人皆知芝诺心有猛虎，柏拉图却让我们看他细嗅蔷薇：对哲学的虔诚，让性烈如火的芝诺在天才少年面前谦逊退让；我们愈是感怀芝诺杀身成仁的壮烈，他的温柔笑意便更加动人。

哲人的言（*λόγος*）即是行（*ἔργον*），行是无言之言，言行互相证成。在苏格拉底面前谦退少言的芝诺，始终在用生命讲述哲学的真义：掌握辩证法是为了追求形而上的真理，而非谋求世间的权力。柏拉图为何要安排“几乎从未到访雅典”的芝诺与少年苏格拉底相遇？或许在柏拉图心中，唯有伟大的巴门尼德的教导，以及高贵的芝诺的无言之教，才配启蒙雅典帝国旷世大哲苏格拉底。

以下巴门尼德的哲学示范正式开始。照例由现场年纪最小者负责对话——这也是此后苏格拉底对话的基本程式，亚里士多德由于年纪最小，担任了巴门尼德的对谈者（137bc）。七位在场者中（除去不知

名的两人)，有三位哲人（巴门尼德、芝诺，与未来的哲人苏格拉底），两位从政者（皮索多鲁与未来的政客亚里士多德）。皮索多鲁作为芝诺的朋友与学生，一生历经战败放逐的命运考验、党派斗争的政治风暴而得保晚节；而对芝诺学说一知半解的亚里士多德，最后堕落为施行暴政、践踏良善、罔顾正义、恶名昭著的三十僭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这位亚里士多德，曾在皮索多鲁家与苏格拉底大谈“美”、“正义”、“善”等高尚的话题（135d），并与苏格拉底一起接受了巴门尼德与芝诺的哲学洗礼。下面我们即将看到，就在帝国霸道崛起的时刻，哲学悄然来到雅典城外，走进了少年苏格拉底的心灵，也落入了未来僭主的掌中。

巴门尼德从关于“一”（τὸ ἓν）自身的假设出发，给出了八组论证。这八组论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如果一存在”（“εἰ ἓν ἔστιν”）（1—4）；第二部分论“如果一不存在”（“εἰ μὴ ἓν μὴ ἔστιν”）（5—8）。

第一部分论证又分为两对论证：a. 论“如果一存在”（1—2）；b. 论“如果一存在，非一的事物是何性质”（3—4）。

a. “如果一存在”

1.（137c—142a）：巴门尼德从“如果一存在”出发，最终竟推导出了“一既不是一，又不存在”这个与前提相悖的结论。

2.（142b—157b）：巴门尼德再次从“如果一存在”出发，最终又推导出了“一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个自身相悖、复与前提相悖的结论。

巴门尼德运用辩证法神乎其神，在场者（包括我们）大开眼界：哲学逻各斯竟有如斯力量！此后我们将继续跟随苏格拉底，见识大大小小的智者们的诡辩术：有的（如欧绪德谟兄弟的诡辩）不过是徒有其表的小把戏，有的（如当世第一大智者普罗泰戈拉的智术）却与哲学的逻各斯方式极为类似。当哲学（“一”）与类似哲学的智术（“非一的事物”）在雅典自由的思想市场上共同流通，看上去真好像“一既不是一，又不存在”或“一既存在，又不存在”。此前巴门尼德批

判苏格拉底“相论”的“类似”假设、即设若“相”为模型、存于自然，其余皆为仿本，所谓事物分有“相”，实为类似“相”（132d-133a），已是在为“一”、为真正的哲学预先铺设防线。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类似不是是，因此是不是。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也是哲学的底线。

b. “如果一存在，非一的事物是何性质”

3.（157b—159b）：论“如果一存在，非一的事物是何性质”，巴门尼德的推论是：非一的事物既分有一、又是多，因此具有一切相反的性质，既类似又不类似自身，既相互类似又不相互类似。

4.（159b—160b）：再论“如果一存在，非一的事物是何性质”，这回巴门尼德得出了与上回完全相反的推论：非一的事物既不分有一、也不是多，既不是类似自身，也不是不类似自身……

陈忠寰先生认为，b组论证（3—4）表明：柏拉图在此提出了一个新的“相论”：在这里个别事物乃是“相”与范畴的结合，这与《斐多》、《理想国》诸篇中持“分离”说的“相论”截然不同。至此，“相”与个别事物的分离、“相”或范畴间的分离所引起的困难，柏拉图在这里一举解决了（《巴曼尼德斯篇》，注393）。换言之，柏拉图在这里让巴门尼德为少年苏格拉底一举解决了“相论”的难题。人们普遍认为《巴门尼德》属于柏拉图后期作品，想来亦应如此：唯有当柏拉图与巴门尼德年纪相仿、道养功深之时，才有如斯笔力，描摹得出一代大哲巴门尼德的莫测高深。

问题在于，既然巴门尼德已出手为苏格拉底解决了问题，为何当苏格拉底到了成熟的年纪，还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相论”（《理想国》）？公元前399年，爱利亚学派后人再度来雅典与苏格拉底论道，并进一步深化提升了当年巴门尼德的方法（《智者》、《政治家》），为何苏格拉底直至七十岁临死之前，还是固执己见、选择坚持自己最初的“相论”（《斐多》）？这才是我们此后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接下来，巴门尼德从“如果一不存在”出发，开始了第二部分的论证。第二部分也分为两对论证：c. 论“如果一不存在”（5—6）与d. 论“如

果一不存在，其他事物是何性质”（7—8）。

c. “如果一不存在”

5.（160b—163b）：巴门尼德从“如果一不存在”出发，最终推导出了“非存在的一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个自身相悖、复与前提相悖的结论。

6.（163b—164b）：巴门尼德再次从“如果一不存在”出发，最终又推导出了“非存在的一部分有存在，因此不拥有任何性质”这个与上一推论相悖的结论。

c. 5—6 推论与 a.1—2 推论互证。

d. “如果一不存在，其他事物是何性质”

7.（164b—165e）：论“如果一不存在，其他事物是何性质”，巴门尼德的推论是：其他事物既是一、又是多，因此具有一切相反的性质，既类似又不类似自身，既相互类似又不相互类似。

8.（165e—166c）：再论“如果一不存在，其他事物是何性质”，这回巴门尼德得出了与上回完全相反的推论：其他事物既不是一、又不是多，因此具有一切相反的性质，既不是类似自身，又不是不类似自身……

d. 7—8 推论与 b.3—4 推论互证。

到此为止，巴门尼德从两造出发而皆中鹄的，运用辩证法的威力圆满解决了少年苏格拉底的难题。而我们的问题是：（柏拉图笔下的）巴门尼德不惜违背自身的哲学观念（“一切是一”），出手帮助苏格拉底实现他的论证（“一切既是一、又是多”），是为了什么？再进一步，（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实现此论证的目的又是什么？

公元前 499 年希波战争爆发，古希腊从古风时代进入了辉煌的古典时代。公元前 478 年，雅典战胜东方的波斯帝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帝国。而希腊意义上的“帝国”（ἀρχή）绝不仅是一种武力征服的概念，成为“帝国”的同时意味着成为“开端”、“本源”、“首要原则”以及“一”。按：古希腊的数（ἀριθμός）不包括一，数

始于二，因此数是“多”；一不是数，而是“数之开端”（ἀρχή τοῦ ἀριθμοῦ）。见陈康注《巴曼尼得斯篇》，注 251。

换言之，一个政治共同体要担当世界的本源，并为之提供首要原则，方可称之为帝国：它必须是“一”，据此统治世界之“多”，并最终由此确定世界秩序。公元前 454 年，雅典帝国违背希腊世界的自由价值与理念，悍然将提洛同盟的金库转移到了雅典，此举实际上破坏了自身的原则，直接堕落为希腊世界所憎恶的波斯帝国专制统治的继承者。帝国的统治原则（“一”）与当下世界（“多”）如何才能真正统一起来？这是雅典帝国时代的思想者必须面对的难题。苏格拉底是雅典本土诞生的第一位大哲，他的哲学不同于此前一切自然哲学，他心系普遍性原则而又关注当下的世界，用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他是第一个试图为伦理德性寻求普遍定义的哲人（Aristotle, *Metaphysics*, 13.1078b）。当西方第一个帝国崛起之时，关注帝国的德性与统治权——这一世间最大的政治问题的哲人亦应运而生。

爱利亚大哲巴门尼德为何要出手帮助苏格拉底？爱利亚虽地处意大利，却是原本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所建。当年为了躲避波斯帝国的暴政，热爱自由的弗凯亚人（属于希腊伊奥尼亚族）放弃家园、从小亚细亚万里漂泊来到意大利半岛定居，建立城邦爱利亚。公元前 499 年波斯帝国爆发伊奥尼亚叛乱——此为希波战争的导火索，盛产勇士的弗凯亚（勇士芝诺便是弗凯亚人）从意大利奔袭小亚细亚加入战斗，此后弗凯亚人建立的城邦爱利亚成为雅典帝国领导的提洛盟邦之一。

爱利亚人心系故土，关心雅典帝国的发展态势，可以说再自然不过。而爱利亚大哲巴门尼德原非单纯之哲人，据斯彪西波（柏拉图的外甥与学园继承人）记述，巴门尼德曾为母邦爱利亚担任立法者（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Book IX, 3.23）——在希腊世界乃至整个西方传统中，立法者比王者更高贵、更智慧的存在，世界时局的任何关键变化，尽在其观察把握之中。（柏拉图的）巴门尼德

之所以要在公元前 454 年到访雅典，帮助苏格拉底沟通哲学 / “一” 与政治 / “多” 的世界，或者说，帮助苏格拉底用具有普遍性的德性来制衡当下帝国的强力，这与柏拉图此后审时度势欲行其道、三赴意大利叙拉古矫治僭政，其用意固一也。

巴门尼德最后总结云：无论一存在或不存在，一与其他事物，相对于自身以及相对于彼此，都既存在，又不存在。这时我们注意到，一直负责对谈的亚里士多德已哑然无声，而天才少年苏格拉底击节应答：非常正确！（166c）在苏格拉底的铿锵应答声中，这场精深恢宏的哲学对话就此结束。

《巴门尼德》这场关于“一”的对话，同时也是全部柏拉图对话的“一”与开端。当信奉多元价值的雅典民主制帝国在伯里克利治下即将到达全盛巅峰的时刻，巴门尼德及其哲学的到来，为帝国日后深陷“一”与“多”之间的思想纷争埋下了伏笔；而苏格拉底身为柏拉图对话的主人公，第一次登台亮相便是作为巴门尼德与芝诺传法的对象，其后的命运亦可知矣。

雅典将军皮索多鲁当初聆听这场对话的时候，雅典还是举国欢腾的盛世；当他流放归来、能够向年轻人安提丰转述这场对话之时，距离那次泛雅典娜大节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帝国已到了行将倾覆之际（雅典帝国亡于公元前 404 年）。^① 安提丰青春年少，而皮索多鲁垂垂老矣，

① 据柏拉图说，安提丰是在“μειράκιον”时期听皮索多鲁讲这个对话的（126c）——这是柏拉图留给我们的又一个时间标记，不可掉以轻心。有的中译本把这个词译作“未成年”，这个译法是不确切的，“μειράκιον”指的是 14—21 岁之间的男生（R. Larry Overstreet, “The Greek Concept of the ‘Seven Stages of Life’ and Its New Testament Significance”, p.554），所以译作“青少年”较为合适。安提丰是柏拉图的弟弟，生于公元前 427 年（柏拉图的生年）之后，那么他的青少年时期则是在公元前 413—前 406 年之后，而雅典帝国西西里远征全军覆没——这是帝国走向覆灭的转折点，即发生在公元前 413 年 9 月。安提丰和他的哥哥柏拉图那一辈人，正是生于帝国衰世的一代。皮索多鲁此前是巴门尼德与芝诺在雅典的宿主（《巴门尼德》127c），在苏格拉底还“极其年轻”（15 岁）的时候，他已是成年人（≥ 21 岁），那么他的生年至少应在公元前 475 年之前。他在公元前 426/ 前 425 年冬天被流放（R. E. Allen, *Plato's Parmenides*, p.73），待到他返回雅典、能够向安提丰讲述当年的故事之时（前 413—前 406 年之后），已是当年巴门尼德的年纪，时间已过去近五十年。

伴随帝国一同进入了暮年，最后也许目睹了帝国的末日。逝者已矣，见证过帝国昔日辉煌的老人，把从前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或有托付未来之意？

公元前 387 年，斯巴达与波斯签订《大王和平敕令》，希腊暂时恢复了和平，位于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城邦克拉佐门尼因此能够派遣人员（凯法卢斯一行）到访雅典。^①安提丰在青少年时代曾努力用心研习皮索多鲁传授给他的对话，因此当二十余年之后凯法卢斯等人突然到访，他仍然能够单凭记忆当场复述那场艰深的对话（126c—127a），而对话前后辗转复述下来，时间已过去了六十七年（前 454—前 387 年）。

《大王和平敕令》为希腊带来了暂时的和平，也让波斯重新控制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这意味着雅典已无力争霸地中海，目前再无重回巅峰之可能。克拉佐门尼现为波斯辖地，当凯法卢斯等人要求聆听那场对话，安提丰“起初有些犹豫”（127a）。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将整个故事和盘托出：当凯法卢斯此后向未知的听众转述安提丰转述的这个对话之时，这意味着巴门尼德哲学从意大利出发、路经雅典，现在已经登陆小亚细亚。是安提丰，将守护半生的哲学对话一举送到爱琴海对岸、送到东方；帝国已逝，而在帝国登峰时代到来的哲学犹在自西徂东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安提丰的异父兄长阿德曼图斯说，安提丰现在（公元前 387 年）“像他那同名的祖父一样热衷于骑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马身上”（126c）。此话何意？难道是柏拉图在暗示他这个兄弟玩物丧志？我们不妨另作别解：安提丰是世家名门之后，也是将军皮索多鲁选定之人，同时最重要的是，他是正当盛年的城邦护卫者。公元前 387 年波斯重新控制

① 凯法卢斯上一次访问雅典，应该是在斯巴达与雅典签订《尼西阿斯合约》之后的和平时期（前 421—前 415 年），当时安提丰“还只是个孩子（παῖς）”（126b）。此后战事频仍，交通不便；待到凯法卢斯再次到访雅典之时，城邦之间显然已经恢复自由访问，这只能是公元前 387 年波斯与希腊签订《大王合约》之后的事情。

小亚细亚之后，安提丰迅速作出反应，“热衷于骑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马身上”，开始为雅典未来争霸世界厉兵秣马、积极备战。要知道此后不到十年的工夫，雅典便东山再起，建立了第二海上同盟，世称“第二雅典帝国”（前378—前338年）。若无护卫者阶层的未雨绸缪、远见卓识，雅典安能如此迅速再次崛起？

《巴门尼德》篇涵盖的时间，从公元前454年雅典帝国泛雅典娜大节的盛世庆典开始，直至公元前404年帝国覆灭，又在公元前387年雅典几乎无望重回巅峰的时分，遥遥指向公元前378年第二雅典帝国的重建。《巴门尼德》作为柏拉图最精纯的哲学对话，包裹了柏拉图全部的政治关怀。少年苏格拉底在这里第一次亮相，便显示出惊人的哲学天才，爱利亚大哲巴门尼德与芝诺的示范与教导，深切影响了雅典哲人苏格拉底的一生，也影响了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雅典帝国中后期的思想形态。此后一切篇章，无不由此而起，巴门尼德那场对话的影响与后果，将在柏拉图所有对话中渐次展开。正如《巴门尼德》篇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一”，本篇同时即是全部柏拉图对话之“一”——“一”是开端，也是结局，它既在自身中，又在一切事物中。